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 “成都模式”

——以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为例

赖 斌 黄晓菲 李 炼 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成都模式”:以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为例/赖斌等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220-10009-3

I. ①职… II. ①赖… III. ①旅游教育—职业教育—教育研究—成都 IV. ①F592.7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218 号

ZHIYE JIAOYU JITUANHUA BANXUE DE “CHENGDU MOSHI”: YI LÜYOU ZHIYE JIAOYU JITUAN WEILI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成都模式”:以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为例

赖 斌 黄晓菲 李 炼 等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何朝霞 薛玉茹
解建华
戴雨虹
蓝 海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e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170mm×240mm
14.25
200 千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009-3
4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前 言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我国在新时期开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是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模式创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不断开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涌现出不少的新观点、新案例。当前，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工业 2025”。可见，新的形势对职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机遇赋予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新的内涵。要适应国家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服务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就需要进一步创新职教集团的办学模式，消除校企合作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校企合作“生态圈”，才能有效整合政行企校四方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职教力量。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正是在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的宏大背景下，在服务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地方经济中应运而生的校企合作共同体。它成立于 2009 年 6 月，通过七年的研究与实践，创新构建了区域旅游专业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生态圈理论，并依托成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总结凝练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政府统筹、龙头引领、利益

驱动”成都模式。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职教集团“一体两翼”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逐步形成了“三全三化”旅游专业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生态机制。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校企双主体“利益驱动”的难点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如在推进中高职衔接的过程中，通过高职引领、中职领办专业的路径，建立了“三统三带三服”的利益驱动机制，即统一人才培养标准、统一课程建设、统一考核评价；带领师资队伍建设、带领共享实训资源建设、带领科技服务能力建设；服务成员、服务产业、服务学生。在推进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打造多功能共享性实训基地的路径，建立了项目接单发单的利益驱动机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成都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效果，并得到中央媒体、成都旅游职教集团内外单位的广泛推广应用。

本书紧密围绕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成都模式”展开研究，以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为例，大致上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进行课题的推演。从学理上界定职业教育集团产生的背景、使命和定义，从国内外经验的比较研究视角，厘清职业教育集团办学的演进逻辑，进而提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都模式”的具体内涵、实现路径。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的业务运行进行分析，验证“成都模式”作为区域性专业职教集团体制机制创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本书共九章，各章的安排具体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本书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产业逻辑出发，分析职教集团在服务“五大发展理念”，适应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中的新要求和新使命。从概念上界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及其模式的研究边界，并归类梳理了近年来职教集团在体制机制创新层面的有关文献，从而明确了本书拟解决的教学问题就是区域性专业职教集团在契约式联盟框架内“集而又团”如何更新发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以协同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人才共育和资源共享。

第二章是国内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的研究。涉及国内外职教

集团的办学理念、组织方式、实施方法和具体成效，特别是对整合职教集团多元主体资源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明确了中国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宏观背景下，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模式创新的主要方向和实施策略。

第三章是职业教育集团办学政策环境的实证研究。为了弄清当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现状，特别是政府在制度供给层面对职教集团建设环境的影响，同时为“成都模式”的提出提供本土数据支撑，本书以四川省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省内主要的职教集团，并就政府的制度保障提供了政策建议。

第四章是职业教育集团办学的“成都模式”研究。针对区域性专业职教集团的特殊性，引入“生态圈”理论，从“政、行、企、校”四方合作的利益机制出发，提出了“成都模式”的内涵，即区域专业性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生态圈。进而，提出了“政府统筹、龙头引领、利益驱动”的“成都模式”。并在此模式下，构建“三全三化”旅游专业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生态机制。

第五章是基于“成都模式”的成都旅游职教集团治理体制研究。按照“政府统筹、龙头引领、利益驱动”的要求，阐述成都旅游职教集团在“双主体”管理体制和“一体两翼”的组织结构建设方面的具体做法。

第六章是成都旅游职教集团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中高职衔接，贯通“职教立交桥”是职教集团兼顾多方利益的重要抓手。本章阐述成都旅游职教集团建立的“专业领办”校校合作实施途径，在业务层面开展“三统三带三服务”，并提供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两个专业的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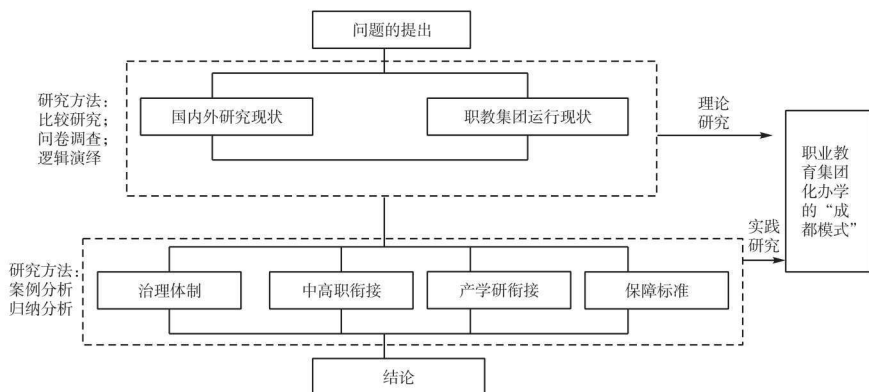
第七章是成都旅游职教集团产学研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产学研衔接一体化，是拓展职教集团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抓手。本章阐述成都旅游职教集团建立的“接单发单”校企合作实施途径，在业务层面开展的“五共同”运行机制的具体做法，并提供成都旅游职教集

团服务精准扶贫的现实案例。

第八章是成都旅游职教集团运作保障的标准体系建设。本章主要提供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管理保障的标准，涉及议事规则、共享实训基地的管理等；二是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的标准，涉及中高职衔接技能训练、人才选拔等；三是社会服务能力保障的标准，涉及科技服务管理制度等。

第九章是成都旅游职教集团实施“成都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成效。指出了本书的创新之处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并详细阐述本课题的应用推广状况。

本书的技术路线图如下：



本书的技术路线图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日新月异，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也在国家和各地的大力支持下，在职教集团各成员单位抱团发展的内生动力驱动下，不断地推出新举措和新经验，本书仅是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大潮中涌现出的一朵小浪花。由于研究者的学识、精力和资源等限制，本书不免有诸多谬误之处，敬请业界专家给予指正。

总之，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体制机制创新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有很多理论需要研究，也更需要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理实一体的中国式集团化办学道路。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00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001)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004)
第三节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进展	(006)
第二章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的国内外比较研究	(014)
第一节 国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分析	(014)
第二节 国内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分析	(019)
第三节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025)
第三章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政策环境的实证研究	(032)
第一节 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政策现状	(032)
第二节 四川省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政策环境的实证调研 ...	(039)
第三节 优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政策环境的政策建议	(048)
第四章 区域旅游专业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生态圈理念下的“政府 统筹、龙头引领、利益驱动”成都模式	(055)
第一节 创新构建区域旅游专业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生态圈 ...	(055)
第二节 “政府统筹、龙头引领、利益驱动”的成都模式 ——以成都旅游职教集团为例	(060)
第三节 建立“三全三化”旅游专业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生态 机制	(066)
第五章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都模式”的治理结构探索	(069)

第一节	人才培养生态圈理念下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管理体制	(069)
第二节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都模式的“一体两翼”治理结构	(075)
第六章	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084)
第一节	“成都模式”视野下的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	(084)
第二节	成都旅游职教集团的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 ...	(090)
第三节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中高职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104)
第七章	产学研衔接一体化服务能力建设	(119)
第一节	利益驱动下的职教集团产学研一体化	(119)
第二节	成都旅游职教集团的产学研衔接一体化运行机制建设	(123)
第三节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一体化的典型案例 ...	(129)
第八章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都模式”的管理制度建设	(133)
第一节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共享型实训基地管理制度 ...	(133)
第二节	成都旅游职教集团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标准	(137)
第三节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产学研合作制度	(161)
第九章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都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成效 ...	(168)
第一节	本课题的理论贡献与不足	(168)
第二节	成果的应用与推广效果	(170)
参考文献		(182)
后 记		(198)
附 录		(200)
	《成都市教育局统筹城乡职业教育“3+N”集团化办学实施方案》	(201)
	《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章程》(修订版)	(207)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政策支持》调查问卷	(216)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面向“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产业经济转型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适应“五大发展理念”，创新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其目标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使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促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提升治理能力，完善职业院校治理结构，健全政府对职业教育科学决策机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2014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进行了全面部署。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1] 明确指出,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以下简称“职教集团”)。集团化办学已成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办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2]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对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职业教育在新的环境中适应需求、遵循规律,广泛开展了集团化办学的实践与探索。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职教集团办学形式不断丰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联结纽带走向多元,逐步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2009 年,教育部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见》^[3],提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积极探索有效的办学模式和实现方式。加强建设,深化改革,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集团办学的生机与活力;提供政策支持,完善管理办法,为集团化办学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加强领导,大胆实践,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工作的健康持续开展,对职教集团这一模式进行肯定与引导发展。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2009 年底,职教集团数量迅速膨胀,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职业教育集团数量为 444 个,参与成员达到 21826 个,其中中职学校数量为 4347 家,高职院校 1153 家,企业 13806 家,行业协会 989 家,科研机构 529 家,其他组织为 1002 家。^[4] 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已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1048 个,成员单位 4.6 万个。^[5] 正如许涛(2011)所言,职业教育集团是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社会形态变革过程的产物。^[6] 尽管职教集团的组建形式和运行方式还有待改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当今职业教育深化机制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局面。

二、研究意义

职教集团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依托,以校企双赢为基本目标。通过组建职教集团,可以充分发挥职业院

校、行业企业、企事业单位各自的优势，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有利于建立优势互补的职业教育发展新的体制机制。但是，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7]，也明确指出当前我国职教集团化办学存在办学基础薄弱、合作关系不紧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六方面问题，建立健全职教集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成为今后职教集团化办学的改革发展方向。因此，本研究围绕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集团化办学的体制机制热点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并以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为案例，深入分析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成都模式”的实践。

（一）理论意义

1. 本书拟丰富学界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理论层面的认识。通过教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组织学的学科交叉视野，综合应用比较研究、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系统梳理国内外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进展，通过比较分析国外职教集团的先进经验，提出职教集团体制机制创新的实现路径。

2. 本书拟对职业教育集团的体制机制创新进行理论探讨。基于职教集团的利益链，深入研究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内生动力机制，提出基于“生态圈”理论的职教集团共建共享利益驱动机制，并就职教集团的内部治理、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政合作，构建职教集团发展运行的“成都模式”。

（二）现实意义

1. 本书基于实证调研，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发展过程中的政策供给不足，并就创新职教集团体制机制的政策保障提出了对策建议。

2. 本书基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成都实践”，以成都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为案例，就校企“双主体”办学体制的形成机理、组织机构建设提供工作路线参考。重点就中高职衔接的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产学研一体化校企合作模式改革中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构建职教集团

运行的标准化保障体系。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这一术语在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概念、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欧盟等组织在职业教育的概念界定上均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名称也经常变动，如 VE（Vocational Education）、VET（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TE（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TVET（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等。目前，TVET（技术与职业教育）这一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也是一个较为通行的概念，它涵盖了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等方面。

职业教育的范围在我国是指学校职业教育和各类社会职业培训，包括职前教育、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以及各类职业培训。学界对职业教育概念的界定有广有窄，如欧阳河等（2006）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一类教育和培训服务，它的本质是帮助人们获得技术型、技能型职业的能力和资格，本质属性是技术技能职业性。它的目标是针对不断变化的劳动环境，通过规范的教育过程传授从事职业活动必需的职业技能、知识和能力，使人获得必要的职业经验。^[8]

本书基于国际惯例和前人研究，认为职业教育是一个与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相并列的一个重要教育类型，涉及职业、技术、技能、教育、培训等业务领域。因此，将职业教育的概念界定为：以培养技术型和技能型劳动者为培养目标，以劳动者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养成为主要内容，通过传授技术性和技能性知识实施人才培养的社会经济活动。

二、职业教育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说，职教集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术语。国外虽然同样存在类似教育集团的组织，如美国的凤凰教育集团、阿波罗教育集团等，但是无论是内涵和形式上都与我国的职教集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名称上也较少直接采用与我国相同的称谓。因此，必须结合我国职教集团的历史使命和运作特征来进行概念界定。纵观当前诸多的职教集团研究成果，正如刘山（2008）等人所总结的，现有的关于职教集团概念的界定“是对现今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在实践层面上的表象特征描述，缺乏概念所应有的最一般化的提炼或者概括”。^[9]

综合比较现有对职教集团基本概念的表述，结合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本书采用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概念，即职教集团是指由多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机构组成，以契约、资产等形式为联结纽带，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以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培训、技术技能积累、社会服务活动等为主要任务，以提高教育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素质，促进产教融合发展和协同创新为目的的合作办学组织。^[10]

三、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

职教集团是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的，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则是以职教集团为组织基础的办学行为。具体而言，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指以集团化的形式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结构优化和功能扩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统一的职业教育服务市场的一种机制和组织形式。^[11]

所谓办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定办学思想为指导，在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规范化的结构形态和运行机制。它是有关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管理体制与各个院校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和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书所指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是职教集团在长期办学行为中形成的行之有效、可示范推广的准则规范和运行机制等。

因此,集团化办学模式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于资源利用与效率提升的需求而产生的,它以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和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效益提升为目的,通过反复实践和磨合而形成的职业院校之间、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职业院校与行业之间、职业院校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与其他机构或部门之间以合作为基础的办学行为方式。各方在共同的愿景下,以职业院校的办学行为为主要内容,围绕人才培养,在资源、人才等方面实现共享与互助。各方合作关系逐步稳定与制度化,结成稳定的集团,实现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进展

我国职教集团办学始于1992年,第一篇研究论文是四川省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的卢家骥1994年发表于《职教论坛》的《组建职教集团的探索》一文。关于职教集团的研究已近22年,但是职教集团的整体发展依然处于探索阶段。高原等(2014)对2011—2013年共计158篇专题研究论文(不包括消息、报道等)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认为学术界关于职教集团的研究更多关注宏观层面研究,包括职教集团的类型、组团模式、体制及运行机制。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基于职教集团的现代职教体系构建和以校企深度合作为核心的教学改革等也颇受研究者关注,这部分文献有149篇,宏观研究90篇,占总数的56.96%;微观研究39篇,占总数的24.69%;中观研究20篇,占总数的12.66%。^[12]不少学者的专著也对职教集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如黄尧(2009)对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现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国际比较、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有关理论研究等进行综合研究,最后提出

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有关政策建议。^[13] 鲍贤俊（2015）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角度，围绕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探讨了职教集团的办学评价体系和内涵建设。^[14]

尽管如此，应世潮等（2015）仍然认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非常缺乏，同时，在现有的 9000 余篇的研究论文中，大多是从校企合作方面展开的，虽然有助于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发展，但并未反映职业教育集团化运行机制的全部内涵。因此，对职业教育集团还需进一步研究，还有待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全面分析与探索，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15]

一、职教集团性质与定位的顶层设计

欧阳恩剑（2016）认为学术界对职教集团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逐渐增多。但存在运作经验总结归纳多，对职教集团的内涵、性质、评价等基本理论问题涉足不深等问题。因此，厘清职教集团的概念，分析其本质及特征，科学归纳类型与发展脉络，遵循政策导向，建立评价体系与标准，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职教集团的健康快速发展。^[16] 有关学者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背景入手，从社会学、教育学、系统科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其性质进行研究。如李耀辉（2014）从社会学视角探究了职教集团的本质，指出了职教集团发展的动因是行业群体的有机团结，职教集团的本质是行业共同体。^[17] 欧阳旻（2015）将职教集团界定为一般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教育联合体。^[18] 而于敏（2016）进一步认为职教集团是教育、利益、机制构成的发展共同体，要注重专业教学的特色性、培训服务的落地性、经济利益的共享性、重循规约束的长效性。^[19]

那么，职教集团建设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对此，有关学者提出了诸多观点。从社会经济转型的视角来看，周玉国等（2014）认为 21 世纪职

业教育集团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职业教育受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出现滑坡和面临困境，职业学校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下降，职业教育在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积累了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职教集团产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职业教育集聚实力和重建校企联合，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20]从治理机制的角度来看，刘晓（2016）将职业教育集团化定位为以集团组织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是以职教集团为组织基础，以促进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和服务能力为目的，以开放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途径的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模式。对其治理无不渗透着多中心治理这一逻辑起点。^[21]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有关研究显示，对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内涵与目的的认识存在从经济的视角向人的视角转变的过程。^[22]郝中强（2016）认为加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政策背景下，国家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对职教集团人才培养目标提出新要求；科学技术进步，对职教集团人才培养方式提出新要求；教育改革发展核心任务，对职教集团发展方式提出新要求；现代职教体系的建设，给职教集团的组织架构、治理结构提出新要求。职教集团应实施国际化战略、优质化战略、校企一体化战略。^[23]因此，职教集团拟推动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常态联系和互动发展问题；推进现代职教体系建设问题；推进职业教育的国际发展问题。^[24]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作为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模式创新，其功能必然与社会经济转型相适应，呈现出多元化。如何礼果（2015）认为组建职教集团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高职引领中职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有效途径。^[25]刘晓宁（2016）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职教集团作为一种横跨教育与产业的跨界组织，需对职教集团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并通过政府政策条例、规范集团身份、建立监管机制等措施，保障职教集团社会服务、整合共享、技术技能积累、体制机制创新等时代功能得到切实发挥。^[26]因此，职教集团需要找准定位，

完成角色转变，履行好参与者、监督者、合作伙伴、服务主体等多重角色的职责，以主体身份多层次多角度地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推进校企合作顺利进行。^[27]

事实上，当前职教集团出现的“集而不团”现象也颇受学界关注。赵向军（2016）指出，所谓“紧密性”职教集团一般具有较强的合作纽带，合作关系制度性、规范性较强，合作稳定深入，利益对等共享，形成一定的集团文化。^[28]有关学者将职教集团视为一个系统，来看待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效能的提升问题。其中徐佳等（2012）提出职教集团发展应具备五个基本办学要素，即学生要素、教师要素、条件要素、管理要素及文化要素，既要使每个要素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作用，又要进行最优办学要素组合，从而使得要素整体效应最优。^[29]黄耀五等（2012）则从多科学的视野对职教集团有效性进行解读，指出职教集团系统动力不足，应推动自组织动力系统（原动力、内驱力、协同力）和外组织动力系统（牵引力、推动力、影响力）形成合力，从而增强职教集团系统运行的效能。^[30]司开林（2014）从集约的角度研究了职业教育，指出职业教育集约化是经济集约化发展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三种价值导向：其一是价值链导向，其二是资源禀赋导向，其三是竞争合作导向。职业教育集约化具有三种基本形态：集团式、集群式和集合式。^[31]

二、职教集团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职教集团的发展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政府、企业和院校之间的联结纽带不紧密上，实质上是集团化办学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有关学者列举了当前职教集团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如沈铭钟等（2014）认为职教集团的独立地位尚未确立，外部条件有待改善，成员组成不够合理，组织架构有待健全，能代表行业或区域先进水平的龙头骨干企业比例不